（上接 2 版）

现出单纯的国学风貌。

冯先生早年的求学经历，严重受制于家庭的经济状况。1945 年的下半年，冯先生一边在小学教书求得生存，一边在刚刚复校的苏州美术专科学校读书。但仅仅学习了两个月，冯先生再次失学，因为美专搬到苏州去了，冯先生没有学费跟到苏州。看看地图，无锡距离苏州咫尺之遥，贫穷让他再次失去机会。但对下一个机会，冯先生一生都感到庆幸。1946 年初，冯先生入学无锡国专。他迎来了更专业更系统的国学教育和学术训练。

1946 年初，冯其庸入学无锡国专。他迎来了更专业更系统的国学教育和学术训练。图为冯其庸（前排右三）在无锡国专的毕业照。

进入无锡国专之前的冯先生，国学已打下一定基础，而无锡国专的训练，不仅称得上是学术性的，而且是中国一流的。民国时期的国学教育，就大学阶段而言，各个学校皆因拥有自主性而各具特色。以清华大学研究院的国学门而言，从 1925 年到 1929 年，仅仅坚持了四年，而国学门还不如四大导师名声响亮。原因可能是众多的，但清华大学国学门越来越西化，国学被文史哲取代的趋势十分明显。读陈寅恪先生的通信就能发现，早期陈先生写信多用国学概念，表扬一个同学会说他国学修养深厚。但后来，国学的概念越用越少，最后都是文学、史学这些概念了。无锡国专，从 1920 年开始筹办，转年正式招生，一直坚持到 1949 年，在西风劲吹的民国时期，无锡国专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上几乎称得上是一枝独秀。

“研究本国的历史文化，明体达用，发扬光大，期于世界文化有所贡献。”无锡国专的这个理念，一直坚持到最后。今天看上去，尤显切实而明亮。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，无锡国专拥有特殊的地位。无锡国专教育的成功，证明了中国书院传统与近代西学结合的成功，研究者通常称之为转型的成功。国专原本一律以经典设课，1927 年为了应对教育部的立案转制，即赢得合法办学资格，增加多门必修通识课，因而形成了经典课与通识课并行的课程体系。而国专的特色课程，仍然是那些以经典书籍为题的选修课。冯先生著有《瓜饭楼述学》一文，回忆无锡国专时讲到：无锡国专的课程，凡经典著作，都有专题课，如《诗经》《楚辞》《左传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老子》《庄子》《墨子》《史记》及杜诗等。无锡国专的教育成功，这份课程目录应该是有启发的。

冯先生进入无锡国专，开始接受高等学术训练。冯先生清晰地记得朱东润先生开设的《史记》课和《杜甫》专题，备引诸家观点，再仔细对比评论，然后得出自己结论。正确的学问方法，很自然引导学生登堂入室。老师们的学问高度，让冯先生领略到了学问的魅力。王蘧常先生讲《庄子》，旁征博引，古今《庄子》的研究，都储藏在先生的脑子里，一个学期没有讲完《逍遥游》，但冯先生却从中看到了学问的渊博与深广，钦佩不已。王先生书法专写章草，天下一绝。冯先生与王先生结下了一生的深厚友谊。在无锡国专的时候，冯先生依然专注于诗词写作，但学问的理念已经确立起来。比如，童书业先生讲秦汉史，直接介绍与唐兰正在进行的学术辩论，彼此的资料，彼此的观点，原原本本地呈现在课堂上，不仅让同学看到了论辩，也看到了学术要有立论根据，要尊重学术对手。大约在 1948 年春，冯先生到达上海的无锡国专学习，于是有了机会利用上海的学术资源。冯先生专注在顾廷龙先生工作的合众图书馆里撰写《蒋鹿潭年谱》，顾先生是王蘧常先生介绍的，图书馆为冯先生提供了十分周到的安排，从而让冯先生顺利完成了《蒋鹿潭年谱》。冯先生记得很清楚的一个事，无锡国专有好几位专门讲唐诗的教授，顾佛影、俞钟彦和冯振心，他们都开唐诗的课，学生可以自由选课，也可以都听，先生们的各自特色令学生在比较中获得认识。为了完成《蒋鹿潭年谱》，冯先生连刘诗荪先生的《红楼梦》研究课都没有听完整，却明确了一个问题：红学是一门学问。

无锡国专的师生，成为冯先生永久的朋友圈，也是最核心的朋友圈。无锡国专的名师太多，周谷城、周予同、蔡尚思、顾廷龙、谭其骧、朱东润、钱基博等等，不一而足。冯先生在上海见过词学泰斗龙榆生先生，介绍人还是王蘧常先生。上海的无锡国专，有位词学教师，名陈小翠，被喻为当今李清照。她指点冯先生的作品，让冯先生很受益。书法名家白蕉先生善长写王体，冯先生书法很得白蕉身传。因为同学严古津的介绍，冯先生拜见了钱仲联，从此与诗学泰斗钱先生结下了一生的缘分。冯先生的同学除严古津外，还有汪海若，同学们一同组建“国风诗社”，作诗填词，也一同参加学运，抗议当局的种种不义。说起来，这应该就是当时学生生活的基本内容。

无锡国专的学长杨廷福，在学校时没有交集，直到 1977 年才相见，但一见如故。杨廷福以研究玄奘、唐律享誉学界，与冯先生交往甚深。杨先生爱酒，懂茶，能诗，善书法，特别喜欢京剧。于是，他常常与冯先生彻夜长谈。此外，杨先生还以《易经》算命著称。据冯先生女儿幽若说，1979 年考大学，请杨伯伯算算能否考中，结果遭坚拒。两位挚友有着太多的一致，所以才会如此倾心。这仅仅是个性使然吗？无锡国专的教育背景是必须承认的。国专学生多博学，一专多能，这应该归功于国专的教育。无锡国专的国学课程设置，没有像后来文史哲那样搞大分工，现在看来是很成功的。

但是，有个问题始终不见冯先生在回忆中提及，那就是无锡国专的师生是否讨论中国文化传统问题，是否涉及对中国文化的价值判断。叶君远在《冯其庸年谱》中，曾经引用冯先生在油印刊物《国风》中发表的一首《调笑令》：“休去，休去。且伴春风同住。夜来香满帘旌。怕见花间月明。明月，明月。何苦照人离别。”无锡国专的师生似乎都是学术与创作并重的，如果仅仅拥有学术能力，那么有关文化的价值判断是可以坚持否定路线的，但是一旦涉及创作，不管是文学还是艺术，坚持否定路线就无法彻底。词汇是传统的，方式是传统的，甚至感情都是传统的，如何坚持彻底否定？这如同“文革”时期读毛主席诗词，当时心底的一个疑问是毛主席为什么不用自由诗。其实，无锡国专的时期，或者无锡国专以后很长时期，有关中国文化的价值判断已经概括性做出，不同的观点可能被扣上政治帽子。看看无锡国专的理念，在当时条件下，说无锡国专实行的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教育路线，应该是不错的。有人写文章，认为无锡国专三十年的办学史，就是以唐文治先生为首的一批文化人顽强坚守，为中国文化殉道的三十年。对此，阅读刘桂秋先生的《无锡国专编年事辑》，证据甚多。而冯先生为此书作序，直接写道“生我者父母，长我者母校也”。“无锡国专，它决定了我这一辈子的人生道路”，具体而言，冯先生认为国专给了自己一是进步思想，二是学术道路，但是关于中国文化的价值，冯先生长期以来似乎一直是回避的。

初版《蒋鹿潭年谱考略水云楼诗词辑校》(1986)

有资料显示，无锡国专的学生主要来自苏浙。无锡国专的国学坚持，是否具有某种地域文化的色彩，有必要深入研究。在传统文化积淀最为深厚的苏浙两省，有一座坚持中国文化本位研究的高等学院，其中必有缘由。其实，无锡国专在中国当时的高等教育中，是个异类，国专的学生也莫不如此。在激进主义文化思潮占据主流的时代，如无锡国专这样以文化保存为己任的学校，生存空间是十分有限的。然而，我们今天再去观察，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：无锡国专是一个珍贵的存在。比如，对于无锡国专的教育，当时主张西化的人士并不满意。国专培养的人才赢得了社会的信心、国际的认可，特别是 1931 年，国联教育考察团的洋专家到达国专，给予国专教育高度评价，盛赞国专保存文化的可贵。教育部的反对声音因为崇洋而消退。

很多年以后，冯先生发言撰文肯定中国文化传统的优秀面，认为国学是中国文化的“母乳”，主张大国学即新国学。无锡国专的文化理念，在冯先生头脑中，似乎一直是潜伏状态，直到新的时期到来。2005 年，冯先生出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首任院长，把无锡国专的课程体系创造性地移植过来，国学研究与保存的传统，再一次在中国的高等教育中获得新生。直到这时，我们才能体会到，冯先生一直保存着国学的火种，冯先生就是一颗国学的火种。

学术人生

冯先生的口述自传最近出版，名为《风雨平生》（商务印书馆）。不能不承认，冯先生这代学人，确实饱经风雨。早年，中国久陷战乱，国运人生，混乱跌宕。新中国之后，又连逢政治运动，迟迟不能迈入正常的学术人生。这不是冯先生一个人的学术命运，这是整个学术界的。然而，冯先生却在这种不正常的环境中逐渐展开了自己的学术研究，如今去回顾，感觉十分别致。

冯先生中学时看过《红楼梦》，但少年更喜欢行侠仗义的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，不喜欢才子佳人的《红楼梦》。无锡国专时期，虽然确认红学为学问，但也没有燃起研究兴趣。1954 年，奉调中国人民大学语文系，正逢中国开展《红楼梦》研究批评运动，胡适、俞平伯等“新红学”大受批判，但冯先生没有参与，仅仅阅读文章，冷眼旁观而已。不过，在“中国古代文学史”课程中，冯先生已经开始大讲《红楼梦》了。到“文革”发生时，冯先生暗地里抄写《红楼梦》庚辰本，当是对红学很有了解甚至产生感情了。

冯先生正式开展红学的研究，源于 1973 年全国红学再次掀起热潮的时刻。当时人民大学已经解散，北京市委宣传部

（下转 4 版）